

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特征事实及障碍因素

李琳, 庞国光*, 郭东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在系统阐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 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并基于2006—2022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 考察其演化特征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 区域间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 但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显著; 富裕方面是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导力量, 物质富裕、成果共享、协调发展、精神富裕的水平依次递减;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绝对差异在扩大, 相对差异逐渐缩小, 极化现象有所减弱, 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模式, “先富带动后富”的空间辐射效应逐渐增强; 共同方面是制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 协调发展维度是核心障碍, 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地区农民收入包容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教育资源则是主要障碍因素。

关键词: 共同富裕; 农民农村; 特征事实; 时空演变; 障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4)03-0030-13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stylized facts and obstacle factors

LI Lin, PANG Guoguang*, GUO 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elab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material prosperity, spiritual prosper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hared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2,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has been measured, and its stylized facts and obstacle factors have been explor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is improving steadily, with a gradient distribution pattern being “high in the east, second in the middle, and low in the west”, western regions showing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The prosperity aspects are the domin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and material prosperity, shared achievement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prosperity being in descending order.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is widening while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is narrowing. Polarization loses momentum. The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overall differenc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shows a “high-high” and “low-low”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The space radiation effect of the pattern “the financial achievement of the pioneers prompts that of the followers”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common aspects are the main obstacles restric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obstacle, and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include social security,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regional farmers’ income tolerance level, income level and education resources of rural areas.

收稿日期: 2024-04-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JLB007);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YBA025)

作者简介: 李琳(1965—), 女, 湖南涟源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县域高质量发展。*为通信作者。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stylized facts;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bstacle factors

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迈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但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②。在此背景下，科学界定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并构建一套科学且全面的评价体系就很有必要，既要客观评价其“水平”，清晰刻画其“态势”，又要全面反映其“差异”，精准把脉其“短板”，进而为相关决策提供有力证据，推动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顺利达成。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已有较多文献关注共同富裕问题，包括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水平测度和实践对策^[1-3]，共同富裕的空间相关性、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4,5]，共享性、富裕度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下的共同富裕实现程度^[6]。然而，专门针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测度的研究还很少见，仅有谭燕芝等^[7]选取农民收入水平、农民财产性收入等 18 个指标，考察了 2010—2020 年中国省域农民共同富裕水平，其指标选取主要聚焦于物质富裕层面，忽视了对精神富裕和城乡、区域及群体间的发展差距（下文简称“三大差距”）等维度的考量。此外，其他相关研究则主要选取单个指标来量化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如王轶和刘蕾^[8]以农民工月均工资、涂圣伟和杨祥雪^[9]以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替代变量。但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发展系统^[10]，这种单一化的衡量方式，必然无法客观地反映其特征事实。

在新发展阶段，虽然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与共同富裕一致，但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行区别研究仍有重要的价值：其一，在研究范畴上，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非均衡化问题，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的外部环境、历史演进和特征事实也显著区别于城市共同富裕^[11]，这意味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和共同富裕必

然存在鲜明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12]，对于这一过程的任何理解，都应将逻辑推演和现实状况紧密结合，通过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充分刻画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特征变化背后的客观规律及核心障碍因素，如此才能更具针对性、系统性、科学性探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路径。基于此，本文拟在深入阐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定量揭示其发展水平、演化态势及障碍因素，从而为补齐研究短板和谋求新发展路径提供重要事实依据和决策参考。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科学阐释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富裕和共同两个方面，构建出涵盖“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四个维度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测算中国 31 个省（区、市）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总指数和各层级指标指数，为全面把握其特征事实提供经验证据。第二，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 基尼系数测算与分解、Moran's I 指数分析等方法对其演进态势、区域差异及来源、空间相关性特征展开多维刻画，为充分反映其演化规律、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寻求差异化推进路径提供现实依据。第三，引入障碍因素诊断模型排查制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的核心梗阻，为精准定位各区域发展着力点提供实践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理论分析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出发点是“为了全体人民”、实现方式是“依靠全体人民”、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共享”^[13,14]。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兼顾效率和公平，效率是指把“蛋糕”做大、做好的能力，彰显的是财富保有量的高低；公平则指把“蛋糕”切好、分好的要求，突出的是合理分配能力的大小^[15]。共同富裕既是“富裕”和“共同”的有机统一，也是公平与效率、发展与共享的内在统一^[16,17]。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有机构成，必然具备共同富裕的一般要义，又因其特定对象、领域和内容而呈现出独特内涵。

相较于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对象是农民群体,主要关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其目标是促进农民富裕,并致力于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农民群体之间的三大差距^[18,19]。具体而言,从富裕方面来看,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应涵盖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维度。其中,物质富裕是指“鼓起农民口袋”,而精神富裕则指“充实农民脑袋”,前者主要关注多渠道促农民增收,持续做大农民物质财富保有量,后者更多侧重于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增强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两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从共同方面来看,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紧扣高质量发展中的公平要求,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深刻理解共同方面所蕴含的公平^[20]。具体来说,“直接公平”体现在广大农民农村能够切实共享发展成果的现实情况上,如农村教育资源、农村医疗资源等,它直观反映了成果分配的公正性;而“间接公平”则是指将三大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且均衡的范围内^[10]。这就要求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仅要落实直接公平,而且要着力促进间接公平;既要推动更多发展成果在农村落地生根,释放红利,也要加快缩小“城优乡差、区域失衡、收入鸿沟”的多元差距,促进健康、协调发展^[13,21],因此,共同方面应涵盖协调发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以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石,通过不断提升农民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富裕水平,逐步缩小城乡间、地区农村间以及农民群体内部的发展差距,确保发展成果广泛且深入地惠及农村地区,最终实现农村的全面繁荣,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该具备以下独特内涵:

(1) 物质富裕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农民物质富裕意味着农民的物质资本累积达到一定水平,能够满足农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及消费愿望。这不仅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果,更是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直接体现^[22]。具体而言,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是物质富裕最直接的表现,它反映了农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而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特别是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则是物质富裕的间接体现,它表明农民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开始追求更高品质、更多元化

的消费体验。此外,优质舒适的居住环境也是农民物质富裕的重要体现,它直接反映了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智能手机等数字化设备在农村家庭的普及应用,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进程,因而成为衡量农民物质富裕的重要内容。

(2) 精神富裕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实现农民精神富裕,其核心在于不断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充分满足农民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引领农民在精神生活领域达到丰富、充实和满足的状态^[23]。据此,本文将农民精神富裕划分为精神软富裕与硬富裕两个层面。精神软富裕主要体现在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稳步提升,文化消费能力有效释放,进而农民在精神层面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而精神硬富裕侧重于农村文化设施硬件的完善与普及,涵盖有线电视、广播节目以及文化站等多元化设施,确保农民能够便捷地获取丰富且高质量的文化资源,进而为农民精神富裕水平的持续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3) 协调发展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内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并非追求城乡间、地区农村间以及农民群体内部达到同一富裕水平,而是旨在合理调控三者之间的差距,确保农民农村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实现均衡、可持续的富裕。当前,农村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农村人力资本差异显著等短板长期存在,使得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城乡、区域及不同农民群体间发展差距的现实挑战。此外,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化技术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间以及农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24]。在此背景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增强农民群体收入包容性,自然成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内容^[25]。

(4) 成果共享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重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农村发展环境,同时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不断改善民生,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农民农村^[26]。因此,医疗水平、教育资源、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重点民生福祉领域,自然成为衡量发展成果惠及农民农村的核心指标。此外,

鉴于绿色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和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便成为绿色发展成果在农村普惠共享的鲜明体现^[27]。

(二)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深入认识，在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时，既强调评价指标的实用性与简明易懂性，以精准反映其发展方向，又避免其过于复杂导致理解和应用上的困扰。同时，本文严格遵循指标遴选的科学性、全面性与可操作性等原则，力求评价体系全面而精准，最终构建出包含“富裕、共同”两个方面，“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四个维度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表 1）。具体构成如

下：一是选取农民收入水平、农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结构、农民住房水平以及农民智能手机拥有量 5 个指标来衡量农民物质富裕水平。二是选取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农民文化消费水平、农村广播节目覆盖率、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5 个指标来反映农民精神富裕水平。三是选取城镇化率、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距、地区农民收入共享水平、地区农民消费共享水平、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农民收入包容水平 7 个指标来衡量城乡间、地区间以及农民群体内部的协调发展水平。四是选取农村医疗水平、农村教育资源、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生态环境 5 个指标来反映农民农村成果共享水平。

表 1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两个方面	四个维度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属性
富裕	物质富裕	农民收入水平(X_1)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农民消费水平(X_2)	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
		农民消费结构(X_3)	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农民住房水平(X_4)	农民人均住房面积(m^2)	+
		农民智能手机拥有量(X_5)	农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部)	+
	精神富裕	农民人力资本水平(X_6)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农民文化消费水平(X_7)	农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	+
		农村广播节目覆盖率(X_8)	农村广播节目人口覆盖率(%)	+
		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X_9)	农村有线电视实际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比重(%)	+
		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X_{10})	农村每万人所拥有的文化站个数(个)	+
共同	协调发展	城镇化率(X_{11})	城乡人口数之比(%)	+
		城乡收入差距(X_{12})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城乡消费差距(X_{13})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	-
		地区农民收入共享水平(X_{14})	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全国农民收入水平	+
		地区农民消费共享水平(X_{15})	各地区农民消费水平/全国农民消费水平	+
		农民内部收入差距(X_{16})	农民收入基尼系数	-
		农民收入包容水平(X_{17})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成果共享	农村医疗水平(X_{18})	农民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个)	+
		农村教育资源(X_{19})	农村小学师生比	+
		农村基础设施(X_{20})	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例(%)	+
		农村社会保障(X_{21})	农民转移性收入(元)	+
		农村生态环境(X_{22})	农村绿化率(%)	+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总指数及两方面四维度的指数，原因在于熵值法具有客观赋权的优点，可以有效避免专家赋权的主观性，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各项指标在综合指标中的重要性，进而保证测度结果客观准确，具体操作步骤

参见伍国勇等^[28]的研究。

核密度估计法作为一种参数性估计法，不仅具有模型依赖性较弱和稳健性强的优势，同时克服了参数估计中函数形式设定的主观性问题。因此，本文借鉴姬志恒^[29]的研究方法，采用核密度估计刻画中国整体及四大区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位置、态势、延展性以及极化趋势，试图总结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演进规律。

核密度估计法虽能生动地揭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绝对差异的演化态势,但无法反映其相对差异的变化。由于 Dagum 基尼系数能够将样本的整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组间净差异和组间超变密度三部分,所以常被用来考察空间相对差异问题。因此,本文借鉴 Dagum^[30]的研究成果,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测算并分解中国整体及四大区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相对差异,具体操作步骤参见李旭辉和陈梦伟^[31]的研究。

为揭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广泛应用的 Moran's I 指数来评估其空间相关性。首先,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来检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现象。若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则进一步运用局部 Moran's I 指数展开深入分析和探讨,具体操作步骤参见张旺和白永秀^[32]的研究。

为深入剖析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时空演化特征背后的核心要素,精准识别其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本文特引入障碍因子诊断模型,以明确其发展阻力的具体来源,具体操作步骤参见赵宏波等^[33]的研究。

(二) 数据来源

鉴于“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而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故本文以“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起点,选取 2006—2022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受限于数据可获取性,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本特征事实

(一)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各指数的特征

1. 总指数特征

本文运用熵值法计算了 2006—2022 年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总指数。整体来看,尽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整体水平初期偏低,年均值为 0.298 4,但发展势头强劲。具体地,总指数由 2006 年的 0.127 7 上升至 2022 年的 0.519 3,增幅高达 0.391 6,按照现行增速(9.16%),预计 2033 年即可达到原设想的

2035 年发展目标。在各省(区、市)比较中,上海(0.519 8)、北京(0.471 3)和浙江(0.435 0)因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及区位优势突出,其总指数排名前三。受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及区位条件等约束,甘肃(0.207 0)、贵州(0.210 3)和云南(0.219 3)的总指数相对较低。研究期间,总指数超过全国均值(0.298 4)的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分析发现,这些省(市)高于全国均值的主导因素趋于一致,主要得益于富裕水平相对较高,从维度层面看主要得益于物质富裕和成果共享水平较高。总指数增速高于全国均值的省(区、市)有青海、安徽、广西、贵州、甘肃、四川、海南、江西、重庆、云南、河南、宁夏、黑龙江、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等 17 个省(区、市),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比发现,各省(区、市)总指数均值与增速差异较大,存在发展水平与发展增速“高低”“低-高”的现象。整体而言,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且非均衡化问题突出,这与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明显、专业技术人才少、发展差距大等特征事实基本吻合。

2. 两方面四维度的指数特征

从富裕与共同两方面来看,其指数均呈上升态势(图 1),年均增速分别为 11.65%和 6.40%,年均值依次为 0.168 8 和 0.126 5。这表明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方面均取得了有效进展,但总指数的提升更多得益于富裕方面,其贡献率高达 57.16%。进一步分析发现,富裕与共同方面的指数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敛,即公平的提升速度并未实时匹配效率的实际增长,从而遏制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从四维度来看,各维度的指数均表现出稳中向好态势。其中,物质富裕指数(0.136 2)及其增速(13.13%)均居首位,农民“钱袋子”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为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成果共享指数(0.072 8)与增速(8.17%)紧随其后,发展红利惠及农民农村生活效应显著;协调发展指数(0.053 7)及其增速(4.35%)相对较低,精神富裕指数(0.032 6)与增速(7.24%)较为滞后。因此,加快缩小三大差距,提升农民精神富裕水平成为当下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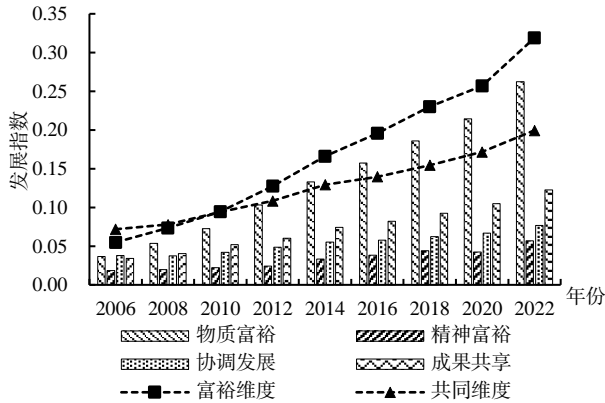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两方面四维度指数的演进趋势

(二) 区域层面发展指数特征

1. 区域层面总指数的特征

参照国家统计局地域分类标准，分四大区域计算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总指数（图 2）。从均值来看，各区域指数均呈逐年递增态势，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0.3749）、东北（0.2919）、中部（0.2778）和西部（0.2492）。其中，仅有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均值（0.2984），西部地区差距最大。各区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非均衡性问题尤为突出，这也

就决定了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可能保持整齐划一，而是有时间差异、分阶段程度的逐步富裕。从增速来看，四大区域呈现西部（10.40%）>中部（10.08%）>东北（9.21%）>东部（7.89%）的发展态势。这表明各区域正朝着更高水平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稳步推进，特别是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显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便利和扶持的基础上，正逐步打破“输血式”的路径依赖，其后发优势愈加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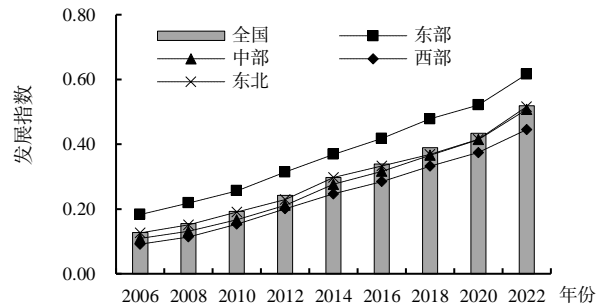


图 2 四大区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总指数的演进趋势

2. 区域层面的两方面四维度的指数特征

图 3（a）—（f）展示了四大区域的两方面四维度指数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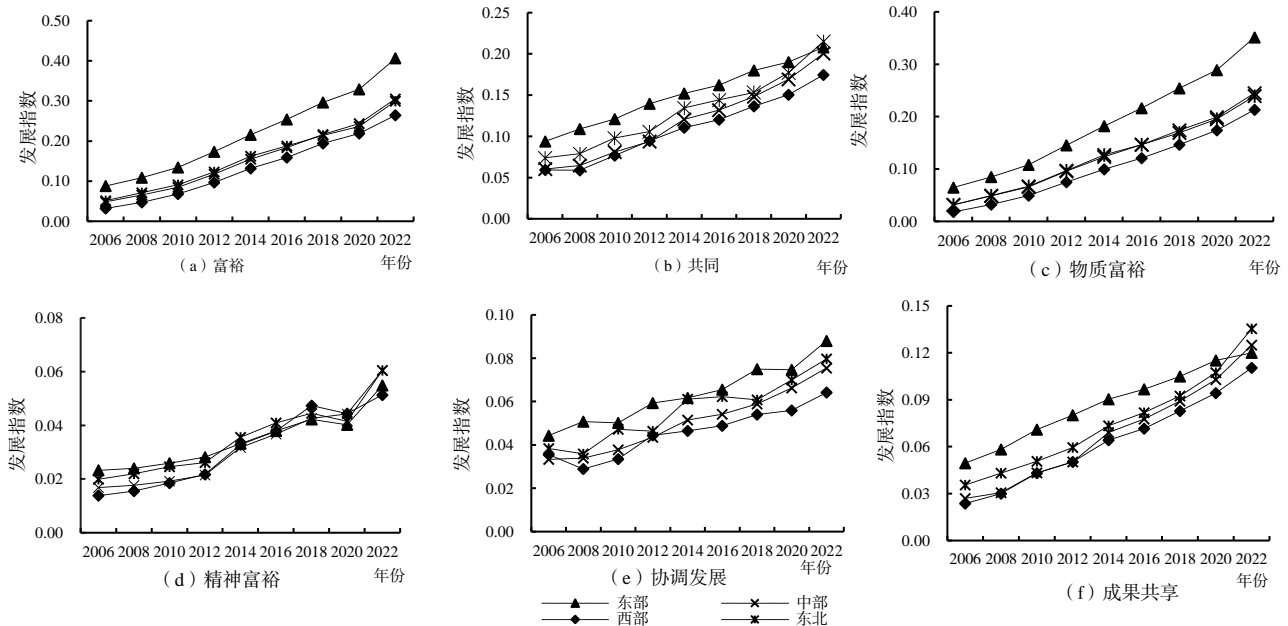


图 3 四大区域两方面四维度指数的变化趋势

第一，从发展态势分析，四大区域的两方面四维度指数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四大区域精神富裕指数的演进态势基本保持一致，均呈“W”形震荡上升，且均在 2020 年明显下降。究其原因，2020 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严重制约了农村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正常开展。值得说明的是，当面对疫情

重大风险挑战时，精神富裕所表现出的波动远高于物质富裕，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物质富裕所展现的韧性高于精神富裕。从增速来看，西部地区富裕方面增速高达 14.14%，位列四大区域之首，这进一步表明西部地区的追赶效应主要来源于富裕方面。中部地区共同方面增速为 7.79%，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第二, 两方面四维度指数的比较。从两方面来看, 东部地区的富裕和共同方面指数分别为 0.221 4 和 0.151 0, 均处于四大区域领跑位置。究其原因, 东部地区凭借其较大的财政支农力度和较强的城乡融合意识, 分布集中的产业集群以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各维度来看, 东部地区物质富裕(0.187 2)、协调发展(0.063 4)、成果共享(0.087 5)水平均居于各区域首位, 而精神富裕(0.034 3)位列第二。这就要求, 东部地区应将促进农民精神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年来, 中部地区依托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特色产业, 并不断完善现代农业与小农户的利益衔接机制, 物质富裕水平(0.124 7)仅次于东部, 但精神富裕(0.031 9)、协调发展(0.052 3)、成果共享(0.067 3)水平相对滞后。西部地区, 各维度水平均表现较差, 特别是精神富裕水平(0.031 1)较低。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洼地, 导致地方政府可能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促进农民增收和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等方面,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设。东北地区, 各维度水平均相对偏低, 如物质富裕水平(0.124 0)仅占东部地区的 66.24%。究其原因, 尽管东北地区拥有广阔的黑土地资源, 但区域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足, 农业产业化程度滞后, 大量土地资源并未得到有效盘活, 限制了农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和产业效应的充分发挥, 致使农民就业与增收受限。

五、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时空演变特征

(一) 基于核密度估计的动态演进

1. 全国层面的分布动态

图 4 展示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曲线。第一, 从曲线的位置来看, 曲线中心位置逐年右移, 表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持续上升。第二, 从曲线的高度来看, 曲线高度呈“先降后升再降”的波动态势, 宽度则表现出“先宽后窄再宽”的演变趋势, 总体上表现为波峰高度降低, 宽度增大, 表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绝对差异总体上在扩大。第三, 从曲线的延展性来看, 曲线呈现明显的“右拖尾拓宽”现象, 表明存在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如浙江、北京), 且这些省(市)与全国平均水

平的差异正逐渐拉大。最后, 从波峰数量来看, 曲线始终存在“多侧峰”现象, 但侧峰高度逐渐降低, 这意味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多级分化”现象, 但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 这种极化现象有所改善。综上所述, 研究期内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虽持续上升, 但省际差异却在不断扩大。究其原因, 在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等政策的综合影响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虽取得了积极成绩, 但地区间在经济水平、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等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 导致低水平省(区、市)很难在短期内赶超高水平省(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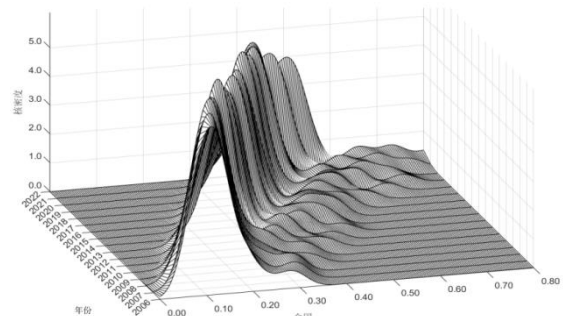


图 4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演进态势

2. 区域层面的分布动态

图 5(a) — (d) 分别展示了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核密度曲线。东部地区曲线的中心位置持续右移, 主峰形态由“尖而窄”变为“扁而宽”, 存在“右拖尾拓宽”现象。这表明东部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 但区域内绝对差异逐渐增大。从波峰数量来看, 东部地区曲线经历了由“双侧峰”到“多侧峰”的演化态势, 表明东部地区内的极化现象较为突出。中部地区曲线的中心位置不断右移, 主峰高度波动上升, 说明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逐年提升, 且绝对差异有所缩小。近年来, 中部地区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 积极打造飞地经济, 区域内各省(区、市)间的协同能力大幅增强。西部地区曲线的中心位置整体向右移动, 主峰高度于 2006—2013 年呈下降态势, 而在 2014—2022 年则呈逐渐上升趋势, 研究末期, 分布曲线出现了“右拖尾拓宽”和“侧峰微凸”现象。这表明西部地区水平持续上升, 但区域内绝对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态势, 考察末期更是出现了高水平省(市)(如重庆、四川)。东北地区曲线的中心位置逐年右移, 主峰高度逐渐上升, 始终保持单

峰状态,说明东北地区水平持续提升,区域内绝对

差异逐渐缩小,并未出现极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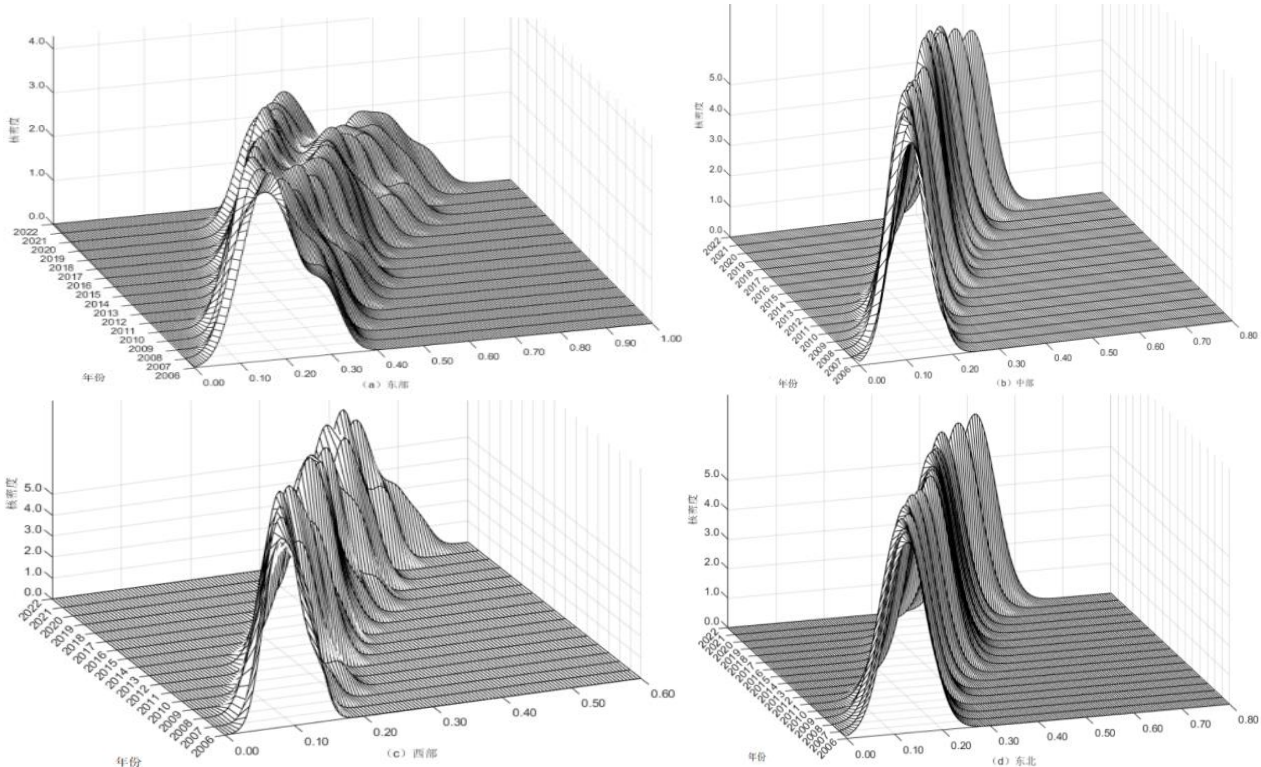


图 5 四大区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演进态势

(二) 基于 Dagum 基尼系数的区域差异分析

1. 全国总体差异

图 6 (a) 显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由 2006 年的 0.220 0 下降至 2022 年的 0.106 0,年均值为 0.130 4。这表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相对差异逐步缩小,且其问题不严峻。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相对差异大幅缩小。究其原因,从国际层面来看,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影响,中国 GDP 增速创 1990 年来新低,东部地区因经济发达,与国际接轨程度较高,所受冲击自然更持久,进而间接缩小了与其他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从国内层面来看,2014 年正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之年,党中央在深化农村改革、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加快推动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2014 年中国确定共建“一带一路”和重点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为促进区域间的交流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可见,缩小东部与其他区域间的差距、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均衡、健康发展效果明显。

2. 区域内差异

研究期内,四大区域基尼系数呈现“东部 > 西

部 > 中部 > 东北”的分布态势,如图 6 (b) 所示。具体地,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虽呈整体向下的震荡态势,但基尼系数均值 (0.131 9) 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主要缘于东部地区内省际差异较大。2022 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4 省(市)的水平领跑全国,构成区域内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的第一梯队,天津、江苏、福建和广东 4 省(市)紧随其后,构成第二梯队,而河北、山东和海南 3 省份水平相对较低,构成第三梯队,区域内“梯度效应”的存在是造成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的根本原因。中部地区基尼系数由 2006 年的 0.083 0 下降至 2022 年的 0.033 0,说明中部地区内部差异逐渐趋于均衡化。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在研究期内持续降低,年均降速为 5.52%,表明西部地区省际差异正逐步缩小。从现实情况考虑,考察期内正是脱贫攻坚战略紧锣密鼓的主要实施期,而西部地区更是主战场,在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政策的强有力刺激下,各省(区、市)水平均得到大幅提升,使得区域内差异显著缩小。东北地区基尼系数则呈“N”形态势震荡下降,年均值仅为 0.019 1。表明东北地区内部差异持续缩小,且不严峻。东北三省水平旗鼓相当主要缘于它们相似的资源禀赋、相近的经济水平以及平均的政

策收益。

3. 区域间差异

图6(c)显示,四大区域的区域间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差异逐步缩小。其中,“东部-西部、东部-中部、东部-东北”之间的差异最为显著,基尼系数均值依次为0.1664、0.1396和0.1321。“中部-东北、中部-西部、西部-东北”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0.0825、0.0754和0.0375。东部-西部之间的差异虽最为显著,但在西部地区强劲的“追赶效应”加持下,两者间基尼系数的年均降速(4.46%)相对明显。从演变态势看,“东部-西部、东部-中部、东部-东北”之间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下降态势,特别是2014年降幅较为显著,这与前文观点相呼应。结合图3发现,区域间差异主要源于物质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方面。比如,东

部物质富裕指数均值比西部和东北分别高出45.26%、33.73%。

4. 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度

从图6(d)可以看出,区域间差异始终是造成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尽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波动,但它对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率高达74.99%。综上,本文认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均衡发展要着重从解决区域间差异入手,而要想解决区域间差异,应该重点从物质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方向出发,鼓励生产要素和发展成果跨区流动,才能有效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均衡发展。另外,从演变态势来看,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度呈现震荡下降趋势,而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度则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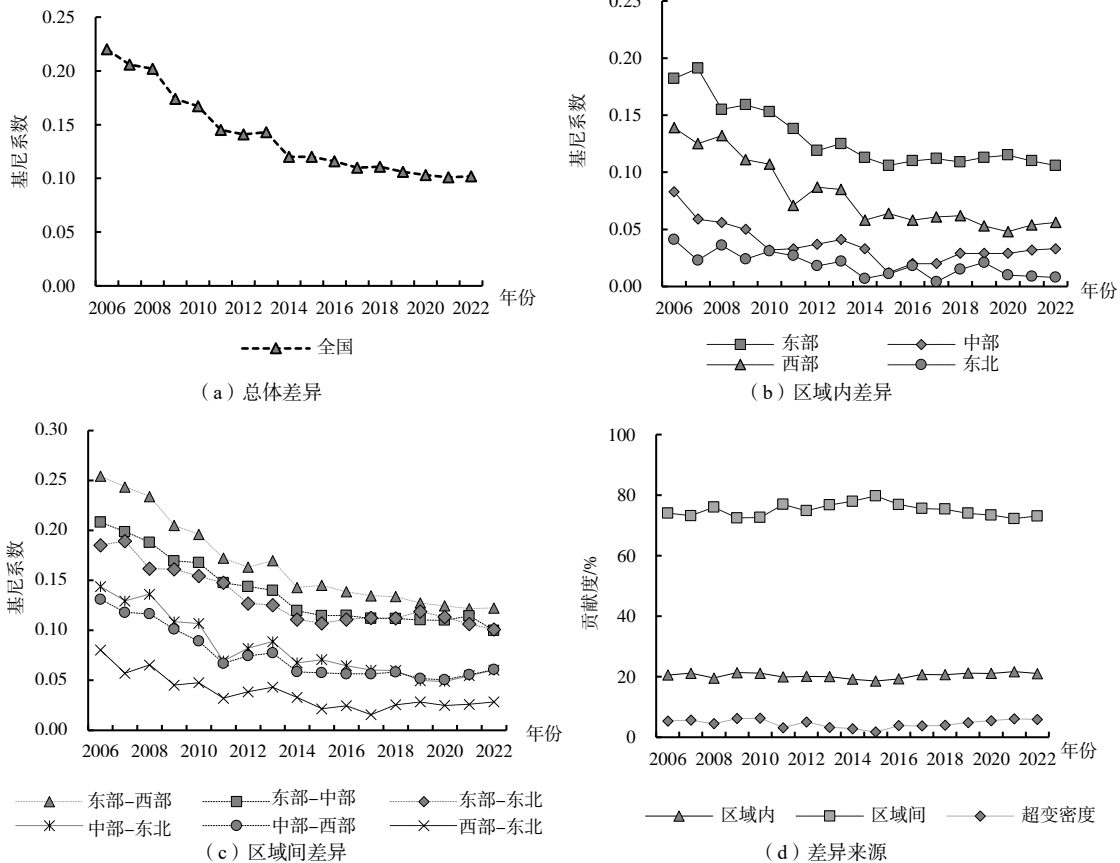


图6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

(三) 基于 Moran's I 指数的集聚特征分析

1. 全局集聚特征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分析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2006—2022年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均显著为正(表2)。这表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

相关,存在“先富带动后富”的空间辐射效应^[5]。在研究期内,全局 Moran's I 指数持续上升,且年均增速达到15.96%。这一趋势反映出省际合作交流机制正不断得到强化与完善。更重要的是,随着这种合作交流的深化,“先富带动后富”的效应也更为凸显,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正向循环。

表 2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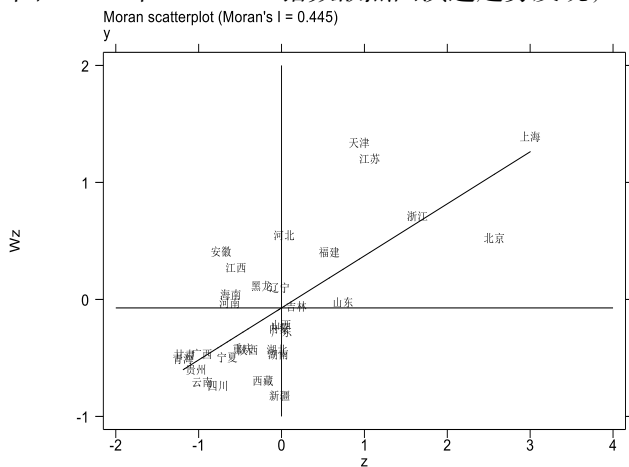
指数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22 年
Moran's I	0.445***	0.410***	0.482***	0.545***	0.525***	0.527***	0.546***	0.523***	0.544***
Z	4.202	3.791	4.484	5.046	4.802	4.828	5.089	4.844	4.996

注：***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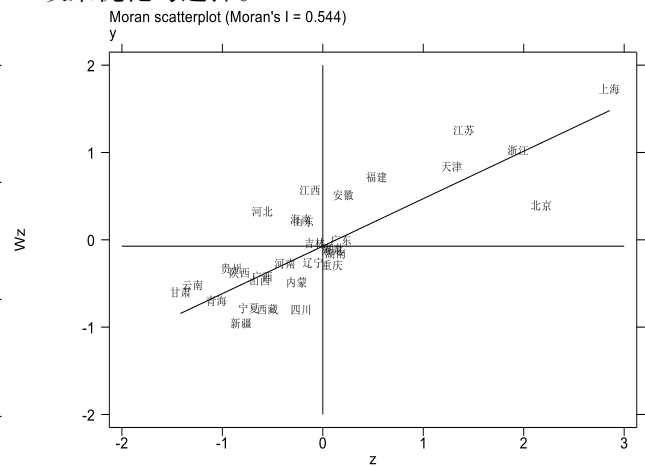
2. 局部集聚特征分析

本文进一步采用局部 Moran's I 指数考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局部集聚模式，并分别绘制了 2006 年和 2022 年 Moran's I 指数的散点图。由图 7 可知，中国多数省（区、市）位于第一、第三象限，即“高-高”“低-低”集聚区，表明样本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其中，“高-高”集聚区内多以东部地区省（市）为主，而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省（区、市）则大部分落在了“低-低”集聚区，省域差异和区位优势显得尤为突出。通过对比 2006 年和 2022 年 Moran's I 指数散点图演进趋势发现，

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稳定性较强，研究期内仅有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 11 个省（市）发生跃迁。总体而言，中国大部分省（区、市）长期位于低值聚集区，再次印证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实现协调发展面临长期性挑战。因此，当务之急是给予低值聚集区省（区、市）更多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缩小省域间的发展差距。其二，需要重点关注发生跃迁的 11 个省份，重新评估现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政策的效能，进行政策优化与选择。



(a) 2006 年



(b) 2022 年

图 7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 Moran's I 指数散点图

六、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障碍因素诊断

(一) 全国层面障碍因素诊断

1. 准则层障碍因素诊断

考察期内，共同方面的障碍度始终大于富裕方面，其障碍度均值高达 59.42%，且呈现震荡上升趋势（图 8）。这意味着“分好蛋糕”是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从各维度来看，协调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阻力最大，其障碍度均值高达 32.87%，表明缩小三大差距应是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成果共享是第二大阻力，其障碍度均值为 26.56%。这表明发展成果并未充分惠及广大农民农村。物质富裕是第三大阻力，其障碍度均值为 22.85%。这就要求各地区应紧抓产业和就业

两个关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确保当地农户，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能够广泛参与。同时，应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不断做大农民财富保有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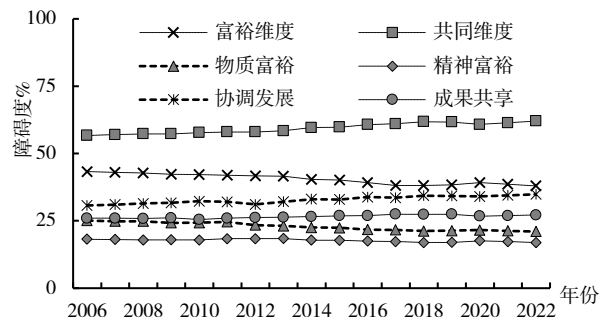


图 8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准则层障碍度变化趋势

2. 指标层障碍因素诊断

表3汇报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从不同年份来看,各障碍因素出现的频率并不一致。其中,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农民收入包容水平出现频率均为100%,且障碍度均值不断攀升。随后依次为农民收入水平、农村教育资源、地区农民收入共享水平和农村生态环境,而农村医疗水平只出现了4次。这表明加快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农民收入包容水平发展是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破题关键。

表3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

年份	指标顺序				
	1	2	3	4	5
2006	X ₂₁ (6.19)	X ₁₇ (6.10)	X ₁₀ (5.98)	X ₁₈ (5.95)	X ₁ (5.94)
2007	X ₂₁ (6.27)	X ₁₇ (6.27)	X ₁₀ (6.09)	X ₁₈ (6.01)	X ₁ (5.94)
2008	X ₁₇ (6.40)	X ₂₁ (6.30)	X ₁₀ (6.16)	X ₁₈ (6.05)	X ₁ (5.91)
2009	X ₁₇ (6.63)	X ₂₁ (6.43)	X ₁₀ (6.36)	X ₁₈ (6.16)	X ₁₄ (6.02)
2010	X ₁₇ (6.89)	X ₂₁ (6.61)	X ₁₀ (6.54)	X ₁ (6.06)	X ₁₄ (6.06)
2011	X ₁₇ (7.25)	X ₁₀ (6.86)	X ₂₁ (6.83)	X ₁ (6.12)	X ₁₄ (6.12)
2012	X ₁₇ (7.53)	X ₁₀ (7.07)	X ₂₁ (6.95)	X ₁ (6.10)	X ₁₄ (6.10)
2013	X ₁₇ (7.82)	X ₁₀ (7.28)	X ₂₁ (7.10)	X ₁ (6.09)	X ₁₄ (6.09)
2014	X ₁₇ (8.24)	X ₁₀ (7.63)	X ₂₁ (6.92)	X ₁ (6.17)	X ₁₄ (6.17)
2015	X ₁₇ (8.56)	X ₁₀ (7.90)	X ₂₁ (7.02)	X ₁₉ (6.24)	X ₁ (6.16)
2016	X ₁₇ (8.77)	X ₁₀ (8.07)	X ₂₁ (6.94)	X ₁₉ (6.40)	X ₁ (6.07)
2017	X ₁₇ (9.13)	X ₁₀ (8.38)	X ₂₁ (6.97)	X ₁₉ (6.60)	X ₁ (6.02)
2018	X ₁₇ (9.54)	X ₁₀ (8.48)	X ₂₁ (6.87)	X ₁₉ (6.82)	X ₂₂ (6.05)
2019	X ₁₇ (10.07)	X ₁₀ (9.18)	X ₁₉ (7.08)	X ₂₁ (6.83)	X ₂₂ (6.40)
2020	X ₁₇ (10.11)	X ₁₀ (9.19)	X ₁₉ (6.96)	X ₂₁ (6.51)	X ₂₂ (6.14)
2021	X ₁₇ (10.93)	X ₁₀ (9.92)	X ₁₉ (7.23)	X ₂₁ (6.76)	X ₂₂ (6.57)
2022	X ₁₇ (11.36)	X ₁₀ (10.25)	X ₁₉ (7.38)	X ₂₁ (6.80)	X ₂₂ (6.71)

注:表中括号内值为障碍度(%)。

从排序变化来看,每年的主要障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2006年、2007年农村社会保障是首要障碍因素,接下来是农民收入包容水平、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农村医疗水平、农民收入水平。此外,

农村医疗水平、地区农民收入共享水平以及农民收入水平分别于2010年、2015年以及2018年开始退出障碍因素前5名。这表明中国在改善农村医疗条件,促进农民增收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等方面取得了有效进展。2019—2022年排在前3位的障碍因素及顺序完全相同,依次为农民收入包容水平、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农村教育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教育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分别于2015年、2018年首次出现在排名前5的障碍因素中,并在后期年份中持续出现。这表明农村教育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制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二) 区域层面障碍因素诊断

本文进一步对影响2022年四大区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障碍因素展开诊断(表4)。从共同和富裕两方面来看,共同方面是制约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主要障碍,其障碍度均值分别高达61.81%、62.99%、67.75%和57.44%。从各维度来看,协调发展是影响四大区域的首要障碍,特别是对西部地区影响较大,其障碍度均值高达40.59%。尽管中国已消除绝对贫困,但农民仍普遍面临“高强度、低收益”的劳动困境,且资源多向城市集聚,加剧了城乡、区域及群体间的发展差距。成果共享则是第二障碍,对东部地区影响较为显著,其障碍度均值为29.72%。这表明,尽管东部地区发展成果相对领先,但区域内差异同样显著。这也就决定了东部地区内发展成果分布非均衡现象突出。同时,东部地区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相对明显,特别是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多向城市集聚,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成果共享障碍度偏高。从2022年的基础指标来看,各区域所面临的障碍因素差异较大。例如,东部地区的主要约束在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欠缺,而西部地区则受到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收入包容性不足的双重制约。

表4 2022年四大区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准则层障碍度

地区	富裕	共同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协调发展	成果共享
东部	37.15	61.81	18.96	18.18	32.08	29.72
中部	38.11	62.99	21.77	16.34	35.71	27.28
西部	38.23	67.75	21.54	17.69	40.59	27.16
东北	43.55	57.44	26.74	16.81	33.82	23.62

七、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启示

本文在系统阐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 2006—2022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随后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 基尼系数测算与分解、Moran's I 指数分析和障碍因素诊断模型等方法探讨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障碍因素。从发展水平来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呈现稳中求进态势，但区域异质性较为明显。具体地，发展水平呈现“东部 > 东北 > 中部 > 西部”的空间分布特征，而发展增速则表现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依次递减的梯度格局。而聚焦到两方面及四维度，富裕方面水平与增速均明显高于共同方面，四维度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物质富裕、成果共享、协调发展、精神富裕。从动态演进来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持续上升，但绝对差异在扩大。其中，东部地区的绝对差异在扩大，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绝对差异在缩小，而西部地区的绝对差异自 2014 年后逐渐缩小，全国、东部及西部地区存在“极化现象”。从区域差异来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波动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其年均贡献度高达 74.99%。其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为显著，区域内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从空间相关性来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呈现鲜明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存在“先富带动后富”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省（市）主要分布在“高-高”集聚区，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大部分省（区、市）则位于“低-低”集聚区。从障碍因素来看，共同方面是制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协调发展维度是核心障碍，而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农民收入包容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教育资源则是主要障碍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农村教育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制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潜在风险与趋势性问题。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是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及其涵盖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类因素量变与质变的集中体现。从本文测度结果来看，要达到 2035 年“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战略目标，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到现在已经完成了 51% 的任务，这是可喜的成绩，但未来仍道阻且长。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1）不断夯实发展基础，提升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首先，各省份要基于自身资源、区位、经济等因素，因地制宜探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特别是对发生跃迁的河北、辽宁、安徽等 11 个省份要重点做好现行政策的评估工作。其次，积极引导各类人才下乡创业和探索实施农村致富能手专项孵化工程，双管齐下有效发挥人才资源引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杠杆效应和农民“先富带动后富”的群体效应。最后，要坚持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多渠道“鼓起农民口袋”，通过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和推动城乡文化资源共享等多举措“充实农民脑袋”。

（2）统筹制定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规划，化解各区域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于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经济、产业、人才等各方面的先发优势，有序扶持一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试点”，充分发挥样板效应。对于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继续针对性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等帮扶政策，尤其是加大对偏远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包容性发展。此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均衡发展应以缩小区域间差异为主攻方向，构建“跨区域”协作机制。各区域应以打造飞地经济为突破口，立足资源禀赋“定位器”，发展需求“导航灯”，从政府、农业企业等层面推动区域间合作，从产业对接、成果共享等层面达成区域间合作，逐步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均衡发展新格局。

（3）精准补齐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短板，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一是在宏观层面，通过创造更多非农就业岗位、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健全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等多种措施并举，加快补齐共同方面的发展短板。二是在中观层面，要着力缩小三大差距。既要纵深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又要大力推进

东部率先发展、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快速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区域间合作力度,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促进区域间互利共赢与优势互补;还要精准实施“提低扩中”帮扶机制,通过精准监测帮扶低收入人群,优化弱有所扶服务,不断壮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三是在微观层面,应以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提升农民收入包容性水平等为核心举措,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全面有效提升。

注释:

-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10/15/c_1127959365.htm.
-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参考文献:

- [1] 张来明,李建伟.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J].改革,2021(9):16-33.
- [2] 万广华,蓝菁,刘震.基于人民幸福感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J].经济科学,2023(2):5-25.
- [3] 林嵩,谷承应,斯晓夫,等.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23(3):40-58.
- [4] 冯苑,聂长飞.中国共同富裕的时空演进、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12):65-84.
- [5] 张磊,邓紫琪,张川川,等.中国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格局测度及区域差异[J].中国人口科学,2023(5):113-128.
- [6] 李金昌,余卫.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J].统计研究,2022(2):3-17.
- [7] 谭燕芝,王超,陈铭仕,等.中国农民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异演变[J].经济地理,2022(8):11-21.
- [8] 王轶,刘蕾.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中国农村经济,2022(9):44-62.
- [9] 涂圣伟,杨祥雪.要素市场化配置、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民共同富裕[J].贵州社会科学,2022(9):148-159.
- [10] 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管理世界,2022(1):52-61.
- [11] 向书坚,郑瑞坤,杨璐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化影响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7):47-68.
- [12] 秦书生,索绳斐.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4):19-26.
- [13] 李海舰,杜爽.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改革,2021(12):1-15.
- [14] 檀学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0(6):21-36.
- [15] 陈宗胜,杨希雷.论中国共同富裕测度指标和阶段性进展程度[J].经济研究,2023(9):79-97.
- [16]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8):117-129.
- [17] 徐鹏杰,张文康,曹圣洁.产业结构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经济学家,2023(5):78-88.
- [18] 万海远,陈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财贸经济,2021(12):18-33.
- [19] 焦长权,董磊明.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社会建设与民生支出的崛起[J].中国社会科学,2022(6):139-160.
- [20] 高鸣,魏佳朔.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历史方位和实现路径[J].中国软科学,2022(8):45-57.
- [21] 张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富强的百年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2021(11):74-94.
- [22] 李琳,田彩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了县域共同富裕吗——来自长江经济带579个县域的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24(4):59-75.
- [23] 傅才武,高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1-24.
- [24] 李怡,柯杰升.三级数字鸿沟:农村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J].农业技术经济,2021(8):119-132.
- [25] 龚斌磊,钱泽森,李实.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12):5-26.
- [26] 赖德胜.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8-26.
- [27] 韩晶,蓝庆新.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16.
- [28] 伍国勇,庞国光,汤钧惠,等.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5-27.
- [29] 姬志恒.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及驱动机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12):25-44.
- [30] 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7(4):515-531.
- [31] 李旭辉,陈梦伟.中国乡村数字化转型:测度、区域差异及推进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3(11):89-104.
- [32] 张旺,白永秀.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2):84-102.
- [33] 赵宏波,岳丽,刘雅馨,等.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J].地理科学,2021(8):1303-1313.

责任编辑:李东辉